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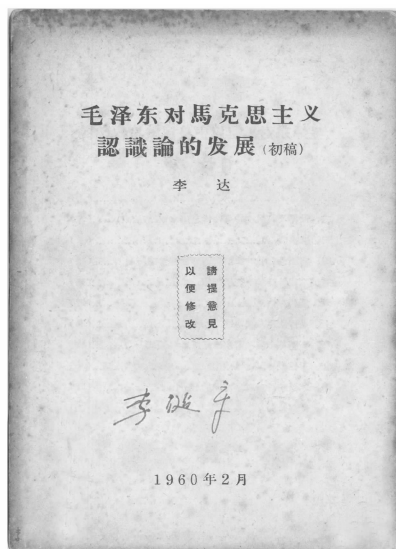
新发现的李达著作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李维武

摘要: 李达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以铅印单行本刊行于1960年2月。这一著作在系统阐发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同时,也蕴含了李达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表达了他认为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时需要加以注意、强调和把握的基本点,体现了他结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它的重新发现,不仅对于李达文献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而且对于推进李达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李达;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960年2月,李达撰写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铅印成单行本刊行。这是继《〈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之后,李达所撰写的又一部阐释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著作。如果说前两部著作都是对毛泽东认识论著作所做的文本解读,那么这本铅印稿则是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所做的系统阐发。但由于这本铅印稿不是正式出版物,印数有限,传布不广,在经历“文革”之后已经很难找到,因此一直未能进入李达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视域。2012年,我在自己的藏书中找出了这本李达著作,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感到它的重新发现,不仅对于李达文献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而且对于推进李达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一本至今没有进入研究视域的李达著作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李达研究及文献整理工作即已开展。由李其驹、陶德麟、熊崇善、段启咸、曾勉之等先生组成的《李达文集》编辑组,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在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所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上,刊载了《李达文集》编辑组撰《李达生平事略》,文后附录编辑组成员曾勉之辑《李达著译目录(初稿)》,按发表时间先后辑录了李达的著作和译作目录。在这篇《李达著译目录(初稿)》中,载录有《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的发展》的篇名,后面标注的时间是1960年,但没有注明具体的月份,也没有注明这一文献是否发表或刊行。这里的篇名与时间,都与今天所见铅印稿封面上的题名与时间不尽一致,表明在编辑这个目录时,编辑者实际上并未看到这篇文献的原件。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要找到这篇文献的原件已经极为困难了。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在收录李达1949年后重要著述的《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没有收录这篇文献。

曾勉之辑《李达著译目录(初稿)》是最早发表的李达著述目录,对以后的李达研究及文献整理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李达著译目录(初稿)》载录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的篇名,但编辑者并未找到这篇文献的原件,导致了后来的李达研究者在这篇文献上出现了分歧:有的研究者所编李达著述目录依旧沿用《李达著译目录(初稿)》的说法,丁晓强、李立志著《李达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附录的《李达著述年表》就是如此;有的研究者所编李达年谱或李达著述目录则不再提及这篇文献,宋镜明著《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附录的《李达年谱》、王炯华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附录的《李达著译年表》、王炯华等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附录的《李达年表》就是如此。这些年谱、年表之所以不再列出这篇文献,大概也是因为找不到文献原件的缘故。2011年以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李达全集编辑与研究”课题组,经过了广泛搜集与细致整理,编辑了更为详细的李达著述目录,其中亦未载录此铅印稿。

我所找出的这本李达撰写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原是先父李健章先生的藏书,封面上还有他的蓝色钢笔字签名,是他自己的字迹。父亲在藏书上一般是不签名的,可能是由于感到这本铅印稿的重要,以避免与别人的相同铅印稿相混,所以才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父亲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1958—1960年曾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他能够有这本铅印稿,可能与这个任职有关。大概在我于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开始学习哲学后,父亲把这本铅印稿移交给了我,但却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以致放在自己的藏书中几乎被遗忘。由于我参加了“李达全集编辑与研究”课题组,具体承担1949年以后李达哲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因此在对上述李达年谱和李达著述目录进行比对中,发现自己藏书中的这本不起眼的铅印稿,竟然是一本至今没有进入研究视域的李达著作。当时,真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这本铅印稿封面上的完整题名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这与曾勉之辑《李达著译目录(初稿)》所载录的题名有两处不同:一是这本铅印稿的题名中“毛泽东”三字后面没有“同志”二字,二是在这本铅印稿的题名最后有“(初稿)”的字样。封面的题名下有“李达”二字,是作者署名。这些文字都是左起横排。在题名和作者署名的下面,是右起竖排为两行的“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字样,并配以波纹线组成的方框。封面最下面印有“1960年2月”的刊印时间。这与《李达著译目录(初稿)》标明的时间相比,有了具体的月份。封面是白纸,上面的所有文字及方框都是红色,在半个多世纪后看起来仍然很醒目。这本铅印稿的纸质不错,根据自己的记忆,这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是很少见的。

这本铅印稿的目次印在封面的背面,共有11节标题,依次为:一、前言;二、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三、反映论;四、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五、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六、思想方法;七、从理性认识到实践;八、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九、工作方法;十、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十一、真理论。铅印稿正文共70页,约5万字。正文有17条注解,全部统一排在正文的后面。由此可见,这本铅印稿实为一本认识论专著。在李达近半个世纪的著述史上,这可以说是他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

这本铅印稿主要是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进行系统阐发,其中所论及的内容,当然以毛泽东所阐述的认识论思想为主,特别是对《实践论》的基本思想,如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人的认识活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两个阶段等,进行了着重的论析与解释。但在系统阐发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同时,这本铅印稿也蕴含了李达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表达了他认为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时需要加以注意、强调和把握的基本点,体现了他结

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这两方面内容相比,当然后一方面的内容更为重要,可以说正是这本铅印稿的理论特点和思想价值之所在,对于李达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即结合我自己阅读这本铅印稿的体会,着重对后一方面的内容进行说明。

二、“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要学习他的认识论”

初读这本铅印稿,感到其中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凸显了认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关键在于学习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可以说,这是这本铅印稿立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里,既体现了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所面临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关注。在经历了1958—1959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面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已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李达的这本铅印稿,实际上正是要从哲学认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

在这本铅印稿的“前言”中,李达对于认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说明。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从宇宙观到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发展着和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一切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并运用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就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这是没有疑义的。”^①然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作为不断发展着和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中国特色与哲学内核;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也需要着力把握其中的中国特色与哲学内核。这个着力处就在于:“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著作,首先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要学习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要学习他的认识论。”^②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正在于它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而这种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以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为其哲学内核的。因此,只有学习和掌握了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才能对毛泽东思想做出深入的了解、真正的把握和有效的运用,也才能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李达认为,认识论之所以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就在于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从哲学上回答并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特别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所着重阐明的三个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三个基本原则,李达在这本铅印稿的“前言”中进行了具体的说明。

第一,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旨在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由此而提出了“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李达指出:“在认识过程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呢?如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说,两者的结合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就是‘有的放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就是‘实事求是’,从客观事实中探求它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做到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法,正是我们认识任何问题时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③在这里,李达不仅凸显了“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而且着重对“实事求是”进行了具体说明,强调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内涵就在于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

①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1960年刊印,第2页。

②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2页。

③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2~3页。

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毛泽东力主把认识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以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认识的规律和思维的规律。李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认识论的领域中,彻底地贯彻了辩证法。他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作为认识的规律、思维的规律。他在认识过程中怎样运用这一规律呢?这就是他经常运用的矛盾的分析方法、阶级的分析方法。毛泽东同志认为任何革命过程都具有复杂的矛盾,都是矛盾的发展过程,所以他研究一个革命过程时,首先搜集关于这一过程的一切资料,然后就这些资料进行具体的分析,找出过程中所包含的许多矛盾,更进而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对基本矛盾,追求它的发生、发展及其消灭的过程,暴露这一过程的规律,因而根据这一规律定出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方法。”^①在李达看来,毛泽东所阐发的矛盾理论,实为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重要内容,构成了毛泽东认识事物、把握对象、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论。

第三,毛泽东力主把认识论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人民群众中获得认识的资料。李达指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还必须有研究资料。譬如一个工人,他有创造某种产品的知识,又有生产工具,但若没有适当的材料,是不能制造出什么产品来的。我们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既然知道把辩证法规律作为认识规律,把辩证方法作为思维方法,那末我们还必须有认识的资料。这认识的资料,就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经验。有了这些认识的资料,我们就可以进行逻辑的加工,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在这里,表现着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是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着的。”^②在李达看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要贯彻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就必须以群众路线作为认识材料的来源;只有通过这个来源,才能获得可靠的感性认识材料,从而进行理性加工制作,在认识活动中真实做到“实事求是”。

通过对这三个基本原则的论析,李达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做出了一个总体性说明,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贯彻着上述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其一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指导;其二是用对立统一和斗争的法则即‘事物的矛盾法则’作为思维或认识的法则;其三是用群众斗争的经验作为认识的资料。简括起来说,毛泽东同志在认识论的领域中,坚决地主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现实的革命问题和建设问题作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从其中引出科学的结论,作为我们实践的指导。”^③这样一来,就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义上,把“实事求是”原则、对立统一规律、党的群众路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融为一个整体,从而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予以了有深度的阐发,揭示了它的内在逻辑、它的丰富内涵、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密切联系,为凸显认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理论根据。

三、“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

在读这本铅印稿时,感到其中的第二个特点,在于通过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阐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是反映论,强调了“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④,强调了只有从反映论入手才能正确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强调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坚持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能离开唯物主义。

在阐发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时,强调以反映论为其核心,本是李达的一贯思想。在《〈实践论〉解说》中,他就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指出:“在分析认识过程之前,必须说明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这一反映论,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核心。”^⑤而在这本铅印稿中,他又再次提出这一思想。但在这里,他所要表达的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而且是为了从哲学上纠正当时盛行的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风气。在这个问题上,李达曾与毛泽东在1958年发生过一次争执。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湖北,广泛流

①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页。

②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页。

③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4页。

④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8页。

⑤李达:《〈实践论〉解说》,载《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行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李达对此深为不满。在见到毛泽东时，他就指出这个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则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毛泽东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讲了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利，也举了各种发明创造，都是因为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争论到后来，就有些激烈了。李达很尖锐地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使得李达在这本铅印稿中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阐释，没有像解说《实践论》那样直接从实践讲起，而是从世界的客观性及其可知性讲起，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主张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入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认识论思想。这一点在这本铅印稿的结构上即鲜明地表现出来：在第一节“前言”之后，接下来的第二节是“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第三节是“反映论”。

在第二节中，李达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必须以唯物主义为其前提。他在这一节开篇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从对于哲学上根本问题的解决开始的。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②他进而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物质是第一性，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物质规定意识，还是意识规定物质？第二个方面是：世界及其规律是否可以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不同，就在于既在第一个方面坚持唯物主义，又在第二个方面主张可知论，反对认识论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能背离唯物主义的前提，去谈人的认识活动，去谈意识的能动作用，去谈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

在第三节中，李达强调从反映论入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在这一节开篇即明确指出：“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我们分析认识过程时，必须彻底展开这一反映论，才能粉碎认识论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③又指出：“我们只有懂得了反映论，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④并提醒人们：“对于反映论的任何微小的歪曲，都会坠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是辩证唯物主义所坚决排斥的。”^⑤为了突出反映论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中的重要性，他在征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后，又专门谈到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论的著作，贯彻着唯物主义反映论。他认为，一切事物的规律都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他在其他许多著作中都强调‘主观符合于客观’，这些都是关于反映论的见解。”^⑥在他看来，只有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入手，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认识论思想。

对于反映论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意义，李达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指出：“依据这一反映论，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即映象或肖像。凡属认识过程中的一切因素，如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思想、规律等等，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依据这一反映论，人们就能够完全地认识客观世界，虽然人们的认识不能一次地完全地反映出客观世界一切的方面、联系和属性，但那些还不曾被反映的方面、联系和属性，人们都能够在认识过程中把它们反映于感觉和概念之中，变为人们所认识的东西。照这样，由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就能够在认识运动过程中，一步一步地接近

① 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6页。

②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页。

③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8页。

④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9页。

⑤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11～12页。

⑥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9页。

于客观世界之完全的认识。”^①在这里,李达强调反映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映象依存于被反映的对象,对象不依存于映象,对象是第一性的东西,映象是第二性的东西。”^②这也就是强调,反映论的出发点,是承认物质世界离开人类意识而独立存在。

因此,李达在看待人的认识活动时,不是只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而是强调它是意识的受动作用与意识的能动作用的统一。反映论中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是以意识的受动作用为其前提的,归根到底,是以客观事物的存在为其前提的。因此,李达说:“正如在生产活动中就自然物加工造出成品一样,我们在思维活动中就感性材料加工造出概念。这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所以我们意识中那种反映外界事物的那种反映是能动的反映。这能动的反映,正是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积极因素。”^③在这里,他强调反映论不能离开“外界事物”及其所产生的“感性材料”,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制的,这个条件和限制就是“外界事物”及其所产生的“感性材料”。

总之,在这些论述中,李达实际上是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表达他自己的有关思考。他力图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唯物主义为前提,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反映论为核心,来从哲学上纠正当时盛行的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风气。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读出这本铅印稿强调反映论的新意之所在和价值之所在。

四、“认识论是辩证法”

在读这本铅印稿时,感到其中的第三个特点,在于通过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阐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与辩证法相结合的,而这种结合的实质就在于从矛盾入手来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

李达认为,强调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结合,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在毛泽东的代表性哲学著作中即已鲜明地表现出来,形成了一种“矛盾的认识论”。他说:“毛泽东同志写了三本专论哲学的著作,即《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实践论》即认识论,是贯彻着辩证法的,它是唯物辩证法的知行统一观。其次,《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虽然是阐明辩证法的著作,但两者的基本精神都是教导我们怎样运用辩证法去认识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矛盾,怎样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和差别,怎样认识矛盾的同一和斗争及其转化的条件,怎样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差别并定出不同的对待方法,怎样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矛盾,以及两类矛盾在新社会中和在旧社会中的差别,等等,并且还引用了很广泛的事例,展开对于各种矛盾的认识过程。所以毛泽东同志这两部论辩证法的著作的基本精神实是矛盾的认识论,即矛盾逻辑、辩证逻辑。”^④在李达看来,这种作为“矛盾的认识论”的矛盾逻辑、辩证逻辑,正体现了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中的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在这本铅印稿中,李达专设了“思想方法”一节,对毛泽东在认识论中对辩证法的运用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他说:“认识论是辩证法。认识过程是辩证法的过程。从物质世界得到感性认识是辩证法,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辩证法,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也是辩证法。我们只有在认识过程中彻底运用辩证法,才能认识客观真理。因此,我们认识任何事物或过程时,必须把辩证法的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思维的规律、认识的规律。”^⑤也就是说,只有在认识论中贯彻了辩证法,运用了对立统一规律,将其作为思想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

如何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于认识论,将其作为认识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思想方法呢?李达认为,这就必须处理好认识活动中的两对矛盾关系:一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二是归纳和演绎的统一。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两对矛盾关系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是在对立统一规律的意义上升的,指的是辩证逻辑的分析

①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9页。

②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9页。

③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10页。

④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4页。这段引文中的“三本专论哲学的著作”,在铅印稿中原文为“三个专论哲学的著作”。这里的“个”字显然是“本”字的误排,故在引用这段文字时改“个”字为“本”字。

⑤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27页。

和综合的统一、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而不是指形式逻辑或符号逻辑的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在他看来，在认识活动中运用好、处理好这两对矛盾关系，就集中体现了认识论的辩证法，因此这是两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方法。在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中，这两个思想方法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体现。毛泽东正是运用这两个思想方法，对中国革命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与成功的解决。

对于辩证逻辑的分析和综合的统一，李达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阐述。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首先应当从分析客观事物、了解实际情况入手，因此，“依照这一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引者注），我们认识任何一个事物，必须运用分析方法，主要的是矛盾的分析方法。”^①也就是说，“当我们研究一个对象时，必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②在对客观事物和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又需要进行综合，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在辩证逻辑上，分析和综合是统一着的，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分析和综合的统一，是‘辩证法的要素’之一。”^③李达以毛泽东成功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为例，具体说明了毛泽东对这一方法的实际运用。他指出，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层层深入的分析，而每一次分析都深化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首先，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实际进行了考察，发现中国自周秦以来是封建社会，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中国社会又产生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外国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终于使这次革命流产，各派封建军阀与各个帝国主义相结合，加重了对中国人民大众的压迫和剥削，使人民大众处于水深火热的状况。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斗争中，逐步地看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这种认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和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由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了。从此，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毛泽东分析中国革命实际和国际革命实际，以及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关系，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由此，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阶级关系，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对内是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的最好的同盟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两重性，共产党如果对它采取慎重的政策，它也可能成为较好的同盟者。因此，毛泽东把这个革命叫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根据这些层层深入的分析，毛泽东进行综合，引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只有认清这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李达认为，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辩证逻辑的分析和综合的统一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而运用这一思想方法的关键，在于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出发，从中寻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性。因此，李达在阐发这一思想方法时特别强调：“为要能够这样开展研究工作，就必须依照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做了的。”^④

对于辩证逻辑的归纳和演绎的统一，李达同样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阐述。他指出，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实际上是与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相联系的。在运用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的同时，还需要运用归纳

①李 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27页。

②李 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28页。

③李 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28页。

④李 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1页。

方法和演绎方法。他说:“在辩证逻辑中,归纳和演绎是统一的。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必须结合于分析和综合的统一。”^①他进一步对归纳和演绎的关联进行了说明。首先,他指出,在辩证逻辑中归纳和演绎是相联系的,这就在于:“归纳和演绎都是辩证法的因素。在辩证逻辑中,归纳和演绎是密切联系着的,两者虽然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却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演绎以归纳为前提,归纳由演绎所补充或订正。如果只是单独地运用归纳或演绎,那样的研究方法就是片面的,不完全的。”^②其次,他指出,在辩证逻辑中归纳和演绎又有其先后的秩序,这就是:“就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归纳在先,演绎在后,因为演绎所据以进行推理大前提应当是归纳推理所得的概括。所以当研究客观对象时,应当先用归纳后用演绎,即是说要从实际出发;不应当先用演绎后用归纳,即是说不要从定义出发。”^③这种归纳在先、演绎在后的秩序,也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人的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李达说:“毛泽东同志斥责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是从书本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指导中国革命,而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又不肯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④李达以毛泽东在1946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断言中国人民解放军终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为例,说明了这种从归纳到演绎的思想方法。他说,毛泽东在当时列举了国内外许多反动派,国内如清朝皇帝、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吴佩孚等,国外如俄国皇帝、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等,他们一贯凶恶地压迫人民、进攻人民而终于为人民所推翻的种种事实,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结论。从思想方法上说,这是一个归纳过程。从这个结论中,毛泽东又推论出“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反动派是纸老虎”的结论。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和西南欧出现了11个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而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和非洲出现了殖民地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而成立的民族独立国家,再加上英、法、美等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独立国家而遭到可耻失败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并且丰富了这个结论的内容。从思想方法上说,这是一个演绎过程。通过这个例子,李达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同志研究一个问题时,总是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经过研究,作出概括,然后根据这个概括来推论到与问题有关的新方面。这就是说,先用归纳,后用演绎,两种研究方法是统一着的。”^⑤

李达在对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进行阐述后,又进一步探讨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必须结合分析和综合的统一? 他的回答是:“这是因为:在归纳过程中,要概括大量的客观事物或现象,必先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出它们中间的共通的本质的规定,才能通过综合,作出科学的概括;在演绎过程中,也必须就推论的前提作具体的分析,从其中找出本质的联系,才能通过综合,作出科学的结论。”^⑥李达又以毛泽东为例加以说明。他指出,毛泽东在得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结论时,就是运用了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同人民的矛盾,得出了双方之间的根本矛盾及其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性,指出前者的腐朽力量必然为后者的新生力量所推翻,前者的反动独裁的逆流必然为后者的人民民主的主流所冲决。毛泽东在运用这个结论推论出“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反动派是纸老虎”的结论时,也运用了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分析了蒋介石反动派和人民解放军之间的矛盾,得出了双方之间的根本矛盾及其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性,指出蒋介石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的战争是背叛人民的、非正义的战争,结果必败,人民解放军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战争是人民拥护的、正义的战争,结果必胜。李达说:“由此可见,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必须结合于分析和综合的统一。”^⑦对于那种把归纳、演绎同分析、综合相分离的做法,李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必然会导致认

①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1~32页。

②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2~33页。

③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3页。

④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3页。

⑤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4页。

⑥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4~35页。

⑦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5页。

识活动陷入误区。他指出：“当运用归纳方法概括大量现象时，如果不就大量现象作分析和综合的工作，而仅仅从形式上拈取一些共同的标识就作出概括，这样的概括必然是肤浅的。”^①又指出：“当运用演绎方法，由一般原理推论到尚未研究过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新对象的时候，如果不就那个新对象做分析和综合工作，而仅仅从形式上引出结论，这样的结论必将变成独断。”^②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李达认为，在运用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时，不能离开唯物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他说：“归纳和演绎是辩证逻辑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因素，当运用归纳和演绎研究客观事物时，必须应用矛盾的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还要有唯物观点和实践观点，就是说，归纳所得的概括，必须经过实践证明它确实符合客观实际，才是正确的，才可以运用这个概括推论及于新冒出来的特殊事物，但对于这个新的特殊的事物，仍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否则，会引出错误的结论。”^③正是这样，李达强调：“辩证逻辑关于归纳和演绎的涵义，同归纳逻辑所说的归纳，同演绎逻辑所说的演绎，是大不相同的。辩证逻辑认为：归纳是从实践到认识，演绎是从认识到实践。”^④在辩证逻辑的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的运用中，“主观反映客观，主观又见之于客观，都必须付出群众的艰辛的实践”^⑤。因此，对于辩证逻辑的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来说，“认识上的归纳和演绎反映实践上的归纳和演绎，又指导着实践上的归纳和演绎”^⑥。从这种唯物和实践的观点出发，李达提醒人们在运用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时，在重视归纳和演绎的统一时，一定要重视实际和实践。他指出：“当我们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研究一个革命问题或一个建设问题的时候，必须做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拟订出计划和方案付之实践，才能实现预想的目的。”^⑦

在李达看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既然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因此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就必须与认识论的唯物论相结合；作为思想方法的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就必须以实际和实践为其前提和基础。因此，李达所说的“认识论是辩证法”是与他所说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相联系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李达所说的“认识论是辩证法”做出准确而深刻的把握。

五、“工作方法是和思想方法一致的”

在读这本铅印稿时，感到其中的第四个特点，在于通过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阐释，强调了毛泽东把认识论转化为工作方法的意義。李达认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一个特殊贡献，这就是自觉地把认识论转化为工作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他说：“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方面，于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关系方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最卓越的贡献。”^⑧正是这样，这本铅印稿设有“工作方法”一节，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的着重阐发。

认识论是哲学上关于认识问题的抽象理论，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实际工作所遵循的基本方法，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那么，认识论何以能够转化为工作方法呢？李达为此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工作方法是和思想方法一致的。”^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实际工作所遵循的基本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体现了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归纳和演绎的统一的思维方法。因此，认识论能够转化为工作方法，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转化与联系中，李达认为有两个工作方法尤为值得重视：一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二是社会调查。这两个工作方法，都是毛泽东十分看重、大力倡导的。

①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5页。

②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6页。

③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7页。

④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7页。

⑤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8页。

⑥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8页。

⑦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38页。

⑧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46页。

⑨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4页。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提出的。在这个决定的开头,毛泽东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李达对毛泽东的这段话十分重视,并作了自己的理解,在这两个工作方法中更凸显了后者。他说:“这里所说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可以用‘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来表达;所说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可以用‘个别——一般——个别’的公式来表达。两者之间,要以‘群众——领导——群众’这一公式最能表现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它应当是领导方法的最基本的原则。”^②在他看来,“群众——领导——群众”公式,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直接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是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相结合的结晶,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共产党工作方法之间的转化与联系。因此,他对这个公式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和凸显,强调“它应当是领导方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联系到李达与毛泽东在1958年所发生的那一场哲学争论,他对“群众——领导——群众”公式的关注、凸显与强调,确实意味深长。

李达进而指出,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所提出的“群众——领导——群众”公式,与在《实践论》中所提出的“实践——认识——实践”公式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在于:“我们党所强调的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是同群众的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为除了群众的实践以外,不能再有别的实践。公式中的‘领导’代表着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也体现着领导者的实践经验。在这种意义上,领导方法的认识论,同关于客观事物的认识论是一致的。”^③他进而指出:“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都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党只有密切地联系群众,坚决地信任群众,领导群众为这一解放事业奋斗到底。为此,党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政策、计划和方案的制订,必须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意见,总结群众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才能发挥群众的革命性和创造性,使这一解放事业能够取得完全胜利。”^④李达认为,这一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创造性贡献,他把这一理论称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或工作方法)的认识论”^⑤。

李达进一步从认识过程上对这两个公式的一致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群众——领导——群众”公式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实践——认识——实践”公式所说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活动。首先,“从群众中来”,也就是从群众的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他说:“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领导者要投身到群众的实践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采用各种调查方法,搜集群众各方面的意见(即详细地占有材料)。这些意见中,有先进的,有中间的,有落后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真实的,有虚伪的;有感性认识,有理性认识;有成熟的经验,有不成熟的经验,等等。总的说来,这些意见是个别的、分散的、不成系统的。领导者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这些意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的工夫,造成理论和概念的系统。即是说,经过研究,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即理性认识)。所以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又是概念形成的过程,判断形成的过程和推理进行的过程。”^⑥其次,“到群众中去”,也就是把获得的正确认识付诸群众的实践。他说:“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又是检验主观是否符合于客观的过程。在这段过程中,领导者依据那个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制定计划和方案,拿到群众中坚持下去。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在认识水平上,比较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是高一级的东西,为要使计划或方案为一般的群众(特别是中间的落后的群众)所乐意接受而自觉自愿地去执行,必须向群众做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群众如果被说服了,自觉自愿地执行上级的计划或方案了,这个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就化为群众的意见。理论一掌握

①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7页。

②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47页。

③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47页。

④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48页。

⑤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48页。

⑥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48~49页。

群众,就成为物质的力量。”^①而这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过程,往往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他说:“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不能一次地、完全正确地把客观世界都反映出来,这就必须反复地调查和研究,才能一次比一次地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更进一步地接近于客观实际。”^②

从重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出发,李达特别强调了社会调查作为工作方法的意义。他指出,既然“从群众中来”是一个调查和研究的过程,那么到群众中去做调查和研究工作,就和党的政策的制定有着密切关系。为此,他特别强调毛泽东在1941年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意义。正是在这个决定中,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③李达对此予以了进一步说明,认为:“这个决定,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句话的真理,认定系统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因此,党中央通告全体党员都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使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结合起来,反对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党中央这一决定在我们党内起了良好的作用。”^④

李达认为,毛泽东所从事的大量社会调查,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典范。他回顾了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认为正是通过这次调查,“创造了这种领导方法的认识论,即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认识论”^⑤。他指出,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亲自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农民运动,到处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进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缜密地研究这些材料,深入地总结农民运动经验,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构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策略基础,这些都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领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组织工农红军,建立红色政权,由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这与前一时期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总结联系起来看,可以说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和社会调查的工作方法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前者确定了总的工作方法,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落实。

李达由此提醒党的干部们:“领导者是掌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但是如果不到群众中去做系统周密的社会调查,不从群众实践中吸取丰富的经验作为研究的材料,那么,理论就变为空洞的东西,方法也无用处,若果这样,理论便和实际相脱离,便成为教条主义。”^⑥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认真而深入的社会调查,才能真正地实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在这本铅印稿中,“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两节所讲的内容,都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没有讲过的。这两节的设立,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反映了李达力图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做出一种更完整更系统的阐释。在他看来,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不仅在于说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说明人的认识活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两个阶段,而且还包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运用这些方法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活动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样一来,就具体展开了这本铅印稿“前言”中所揭示的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三个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义上阐明了“实事求是”原则、对立统一规律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李达不仅在这本铅印稿中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做了专门论述,而且还有过进一

①李 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49页。

②李 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49页。

③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载《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0页。

④李 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0页。

⑤李 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0页。

⑥李 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1页。

步研究这些方法的构想。他在1961年8月28日致武汉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余志宏的信中,谈到了自己今后几年中准备做的六项重要研究工作,其中第六项就是写一部《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①。

六、“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

在读这本铅印稿时,感到其中的第五个特点,就是针对当时理论界正在探讨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予以了高度重视和明确回答。在第十节“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的开篇,李达即指出:“近来许多同志论述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的问题。”^②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反映了理论界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思考,因此李达甚为关注,在这一节中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阐发,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李达首先对主观能动性的内涵进行了阐明。他指出:“究竟‘主观能动性’的涵意怎样?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③为此,他引用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关于“认识的能动作用”的论说,指出从中可以看出:“认识的能动作用,包括着两个过程:其一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到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的过程;其二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即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即根据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制成理论、计划或方案运用到生产斗争和革命斗争中去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不可分离地统一着,这正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所以认识的能动作用,包括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和生产的、革命的斗争两个有机的构成部分。”^④他又引用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论说,指出从中可以看出:“‘自觉的能动性’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这种思想即是根据于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而来的;其二是‘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这即是根据于以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制定的计划、方案、政策等等去从事于生产的或革命的斗争。”^⑤通过这些论析,他得出结论说:“主观能动性或主观能动作用,其内容是和‘自觉的能动性’或‘认识的能动作用’完全相同的,即同样包括着关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和基于客观规律性的实践这两个构成部分。这两个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形成为辩证的统一。只有掌握了客观规律,基于客观规律的实践就能达到预想的结果;只有在符合于客观规律的实践中,才能深入地、全面地掌握客观规律,并发现新的客观规律,因而更促进实践的发展。只有这样,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逐步提高,并可以充分发挥出来。”^⑥这样一来,就对主观能动性的内涵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指出了主观能动性首先就是指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其次才是运用这种认识和把握来从事生产的或革命的活动。

基于对主观能动性的这一理解,李达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以承认客观规律和认识客观规律作为前提;决不能离开对客观规律的承认与认识,去谈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如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合乎客观规律的生产斗争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世界的历史。”^⑦人类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无产阶级只有成为‘自为的阶级’的时候,才能高度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即是说,他们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制定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⑧

李达在这一节中,还专门探讨了领导者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预见问题。他指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要领导人民大众取得革命胜利,如果没有科学预见,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科学预见,又是以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为前提的。“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是认识了客观真理,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客观规律,指出事物或过程发展的倾向,因而拟定计划和方案,作为实践的向导,这就是科学预见。”^⑨换言之,“科学

① 见李达:《给余志宏同志的信(1961年8月28日于庐山)》,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29页。

②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5页。

③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5页。

④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5~56页。

⑤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6页。

⑥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6~57页。

⑦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7页。

⑧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58页。

⑨ 李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61页。

预见是依据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指出事变发展前进过程的科学推测”^①。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之所以能够实现,在实践中证明其正确性,就在于既发挥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又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因此,他坚决反对离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去倡导发挥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在这里,李达实际上从哲学上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进行了断然否定。

七、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理论探索

从上述五个特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达的这本铅印稿,在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进行系统阐发的同时,力图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正确而完整的理解,对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思想路线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特别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风气,李达力图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入手,予以否定和纠正。在这里,实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面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困难局面,所进行的一种自觉而可贵的理论探索。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种理论探索不论其形式还是其内容,在今天看来都有局限性;但李达在这一探索中所阐发的基本思想,所体现的理论追求,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后仍然显示着合理性和积极意义。透过这本铅印稿,我们可以触摸到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一个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与李达发生过激烈争论的毛泽东,在进入1960年后也开始冷静下来,在哲学上有了新的思考,在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原则、认识活动中的分析方法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等问题上,都得出了与李达相一致的论断。1959年与1960年之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肯定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原则,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②同时强调了分析方法的意義,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③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④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中,可以映照出李达的这本铅印稿的思想价值。这种哲学上的重新一致,使得这两位青年时代的好友于1961年8月在庐山上进行了长达几小时的畅谈,从“大跃进”、教育革命、工作作风等问题谈到理论问题,李达坦率地提了很多意见,毛泽东则高度评价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认为此书现在还有很大意义,应当加以修订重新出版。

这本铅印稿在当时没有正式发表。李达将其核心内容概括为《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一文,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1期和1960年2月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李达文集》第4卷中,成为四卷本《李达文集》的压卷之作。

●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85)

●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 李 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初稿)》,第61页。

②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③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页。

④ 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7页。